airiti



# 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不列顛學派
# British? Global? And Critical?

曾　怡　仁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 摘　要

國際政治經濟學（簡稱國政經）自 70 年代開始發展以來，不僅呈現出理論（自由主義、重商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與研究途徑（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的競逐，同時也有美國（American School）與不列顛學派（British School）間關於學科定位、研究議題與方法論上的差別。本文主要目的在於從三個面向來介紹及探討國政經的不列顛學派：一、為何該學派被稱為 British School？與國際關係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有何差別？二、不列顛學派學者偏好以「全球政治經濟學」（Global Political Economy）取代「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作為學科名稱，‘Global’和‘International’到底有何不同？僅涉及世界經濟生產方式的改變？還是包括研究議題與研究方法上的變遷？三、不列顛學派亦被稱為「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Critical IPE），‘Critical’的意涵為何？其和國際關係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有何異同？經由這三組問題的討論，冀望可以對國政經不列顛學派有較充分的理解。

**關鍵詞**：不列顛學派、批判理論、美國學派、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關係

*　*　*

## 壹、前　言

國際政治經濟學（簡稱國政經，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從 1970 年代開始，已經過四〇年的發展，除了有經濟民族主義、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等三大理論，以及理性主義（rationalism）與反思主義（reflectivism）的研究途徑（approach）

airiti



競逐外，①亦有美國學派（American School）與不列顛學派（British School）之間關於國政經的學科定位、研究議題與方法論上的爭辯。如果說七〇年代國政經的出現，是爲了改善過去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與國際經濟學（International Economy）研究相互忽視的情況，②那麼如今國政經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打開美國學派與不列顛學派之間的相互隔閡狀態，並進行兩者間的對話與可能的互補工作，而不再是各吹各的調。2009 年**國際政治經濟學評論**（*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和**新政治經濟學**（*New Political Economy*）這兩本英國的國政經主要期刊，就分別作了專輯來介紹及比較兩學派的特色，以及探討相互融合的可能性，多數學者也期許學派間能有更多的跨大西洋溝通交流，不論未來如何發展，無疑這是一個很好的起點。③至於美國的國政經代表性期刊**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則尚未提供類似的平台編成特刊。

二次戰後至七〇年代這段冷戰期間，**國際組織**主要是研究與安全、和平、區域或聯合國功能組織相關的議題，雖然當時行爲主義研究風潮盛行，但相較於**國際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或**衝突解決**（*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等其他國際關係的刊物，**國際組織**的文章相對較少採用量化研究或者形式理論（formal theory），可說是當時美國國關研究中的非正統。不過，自從基歐漢（Robert Keohane）於七〇年代接掌了該季刊的主編工作以後，其和哈佛大學的老師及同儕們關注的焦點就轉變爲國關（或國政經）研究理論或途徑之間的爭議討論，也稱爲「哈佛學派」（Harvard School）。譬如，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或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等之間的論辯；以及從早先七〇年代的跨國關係（transnational relations）和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研究，經八〇年代的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轉到九〇年代以後的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與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理論，來討論多邊國家間的合作問題，並且每隔一段時間就將討論的成果製成特刊或專書出版。後來**國際組織**的編輯們，如馬

---

註① 一般將國關／國政經理論分爲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兩大研究途徑（approachs），前者以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爲代表，兩者均假設國際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國家是最重要的行爲者且爲理性合一的整體，會去追求國家利益的極大化。同時，在方法論上採行物質的本體論、實證主義的認識論以及理性選擇的分析方法。相對地，一些採取非實證主義（non-positivism）認識論，或反對國家中心研究立場，或拒絕行爲主體單純是利益極大化者假設的理論，包括後現代（Post-modernism）、女性主義（Feminism）、規範理論（Normative Theory）、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與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等，則稱爲反思主義研究途徑。反思主義途徑內的各種理論是因反對一項或某幾項理性主義途徑的假設或方法論而被歸爲同一類，事實上彼此間仍存在著差異。參見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67~169, 172.

註② Susan Strange,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of Mutual Neglec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6, No. 2（1970）, pp. 304~315.

註③ 有關美國學派的專輯討論見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No. 1（2009）. 不列顛學派的專輯討論則見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14, No. 3（2009）.

airiti



丁（Lisa Martin）等人，更偏好將採用形式理論與量化研究等科學方法的文章引進到該期刊。根據一項統計研究，1980 年代前半葉**國際組織**所出版的文章中，不到十分之一是使用形式模型或經濟學研究工具，相對地，到了 2000 年至 2004 年這段期間，數量比例急速上升到將近一半。④維摩（Ole Waever）就預期這種傾向將導致國政經美國學派逐漸脫離「非正統」，而以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作爲未來學科研究發展的主要方法。不過，到目前爲止和美國其他主流政治學期刊比較，**國際組織**登出的文章中使用形式模型的比例還是相對少的。該期刊於 2007 年首次由非美國學者組成的編輯團隊，雖不至於宣布理性選擇理論的適用已經過時，但可以肯定的是編輯方向必然會有所調整，或許可以樂觀地預期將和不列顛學派有更多更好的溝通交流。⑤

反觀國內的研究情形，一向對於美國學派的觀點較爲熟悉，近來則漸有學者投入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國際關係理論（或稱國際社會理論，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ory）的研究，然而對國政經不列顛學派的討論仍相對較少，本文的主要目的即是討論該學派的發展、特色及與美國學派的差異。由於不列顛學派主張國政經應爲一門開放的學科（open discipline），呈現出研究議題、理論與途徑的多元發展，因而不可能在本文就能討論殆盡。本文僅試圖從三個面向來掌握該學派的輪廓：一、從創立和思想淵源上來看，爲何稱爲不列顛學派（British School）？這與之前發展的國關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有何異同？二、一些學者，尤其是不列顛學派學者，偏好以「全球政治經濟學」（Global Political Economy）來取代「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作爲學科名稱，Global 和 International 的差別何在？僅是爲了回應全球化的跨國經濟發展而做改變？還是牽涉到研究議題與方法論上的不同？三、不列顛學派亦稱爲「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Critica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到底 Critical 的眞意爲何？僅是批判當前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或是以國政經美國主流學派的假設或方法論作爲批判對象？如是，則其和受法蘭克福學派影響的國際關係批判社會理論（Critical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又有何差異？

## 貳、「不列顛學派」（British School）的由來

最早將不列顛學派與美國學派的國政經研究區分開來討論的是墨菲（Craig N. Murphy）和圖茲（Roger Tooze）這兩位學者，他們在 1991 年所編**新國際政治經濟學**（*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991*）一書的導論中，將前者稱爲「新國際政治經濟學」（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而後者則爲「正統或傳統的國際

註④ John Ravenhill, “In Search of the Missing Middl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5, No. 1（2008）, p. 26.

註⑤ John Ravenhill, “In Search of the Missing Middle,” p. 26.

airiti



政治經濟學」(Orthodox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⑥之後，陸續有學者將兩個學派的國政經研究做了更爲詳細的比較，包括 2000 年安德希爾 (Geoffrey R. D. Underhill)、2001 年墨菲與尼爾森 (Douglas R. Nelson) 以及 2008 年柯翰 (Benjamin J. Cohen) 等人的著作，在這些文獻裏都直接使用 British School 這個名稱作爲學派的標籤，不過都沒有進一步說明爲何稱爲 British School？⑦

## 一、從英國學派到不列顛學派

國政經不列顛學派 (British School) 不同於較早發展的國際關係英國學派 (English School)，但在華文世界經常將兩者同譯爲「英國學派」就容易造成混淆了。English 和 British 不僅從字面上看是有差別，而且從學派的起源來說，將兩者同譯爲「英國」也是有問題的。English School 是 1959 年劍橋大學歷史系巴特菲爾德教授 (Herbert Butterfield) 等人的提倡，在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 (The Rokerfeller Foundation) 的資助下，一些歷史學者、國關學者、外交官和律師共同組成了「英國國際政治理論委員會」(The British Committee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定期展開學術交流活動，並陸續出版研究論文集，此通常被視爲是 English School 的起源。不過，該學術研究團體最早被冠上 English School 的名稱，則是首見於瓊斯 (Roy Jones) 教授在 1981 年發表於**國際研究評論**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的文章中。⑧瓊斯認爲，該學派的代表性學者如曼寧 (Charles Manning)、懷特 (Martin Wight) 與布爾 (Hedley Bull) 等人之共同學術發源地，主要是位於英格蘭的倫敦政經學院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不過這些學者的研究與十八世紀主要由蘇格蘭人及少數一、二位威爾斯人所共同創建的不列顛 (British) 自由傳統之政治經濟學研究並無眞正的關聯，因此稱爲 English School 比 British School 更爲恰當。⑨對瓊斯而言，English 似乎是專指英格蘭，而 British 則指除英格蘭以外還包括蘇格蘭與威爾斯的英國。然而，相較於法蘭克福學派 (The Frankfurt School)、哈佛學派 (The Harvard School)、哥本哈根學派 (The Copenhagen School)、芝加哥學派 (The Chicago School)、劍橋學派 (The Cambridge School)、佛萊堡學派 (The Friburg School)、伯明翰學派 (The Birmingham School) 和京都學派 (The Kyoto School) 等，都是以該學派研究者初期主要聚集的大學命名，瓊斯既然提到倫敦政經學院，爲何仍

---

註⑥ Craig N. Murphy and Roger Tooze, "Introduction," in Craig N. Murphy and Roger Tooze, eds.,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1), pp. 1~7.

註⑦ Geoffrey R.D. Underhill, "States, Markets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Genealogy of An (Inter?)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6, No. 4 (2000), pp. 805~824. Craig N. Murphy and Douglas R. Nels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Tale of Two Heterodox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0. 3 (2001), pp. 393~412. Benjamin J. Coh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註⑧ Roy Jones,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for Clos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7, No.1 (1981), pp. 1~13.

註⑨ Roy Jones,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for Closure," pp. 1~2.

airiti



將學派稱爲 English School 而不是更爲直接的 LSE School（倫敦政經學院學派），倒是不清楚的。⑩

國際關係英國學派又稱爲「國際社會學派」（International Society School），就較能直接表明學派的研究特色，其認爲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雖然不存在一個類似國內的中央權威政府，但國與國之間的互動並非如美國主流國關理論所稱是處於一種交相攻伐的自然狀態（the state of nature），而是彼此間可以透過權力平衡、外交折衝、國際公法、大國意願與共同的文化價值觀等機制，來形塑與維持一個有秩序的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society）。⑪也就是說，英國學派是以「國際社會」來取代美國主流的「國際體系」概念，認爲國際間的無政府狀態仍然可以是有秩序的。英國學派傳統上關注的是軍事安全、外交結盟、國家主權、治國方略、國際倫理和國際法等「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的議題，因而主要是以國家爲研究對象，對於國際政治經濟問題缺乏足夠的討論。這原因可能是該學派的主要創始者大多沒有受過經濟學的訓練；另一方面該學派發展於冷戰時期，當時國際政治經濟學這門新學科也還沒成立，相形之下對「高階政治」議題的處理就顯得較爲急迫。然而，「高階政治」與「低階政治」彼此間是相互滲透影響，尤其是在後冷戰或全球化時代，很難將兩者完全區隔開來。況且，國際經濟關係是國際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前蘇聯及東歐共黨集團國家的瓦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成爲當今全球性國際社會中的一種重要制度安排。布贊（Barry Buzan）就呼籲歐盟可以作爲英國學派的研究對象，是該學派未來的發展重點。⑫在布贊等人的推動下，1999 年於不列顛國際研究協會（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底下成立了「英國學派和歐盟」的研究工作小組。近來已可見一些學者利用「國際社會」與「世界社會」概念來研究歐盟、全球化以及其他與國際政治經濟相關的議題。⑬另一方面，國政經不列顛學派的研究對象亦超出過去美國學派側重的國際經濟關係議題（貿易、金融與跨國投資等），還包括人權、種族、階級、性別與環保等。如此，就不宜將英國學派與不列顛學派以討論議題是「高階政治」或「低階政治」作爲區分的判準。

---

註⑩ 費納莫爾（Martha Finnemore）就認爲「倫敦政經學院學派」比起「英國學派」 是更適當的名稱。見 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7.

註⑪ 布爾認爲，「國際體系」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相互間具有充分的聯繫，並且充分影響彼此的決定，從而導致這些國家可以作爲某個整體的一部分而行動；而如果一組國家意識到他們之間具有某種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觀，他們就構成了某個社會，在其中這些國家認識到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是被一套共同的規範所約束，而且他們也願意一起建構共同的制度，在此情況下所形成的就是「國際社會」。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London: Macmillan, 1977）, p. 13.

註⑫ Barry Buzan, “The English School as a Research Program: An Overview, and a Proposal for Reconvening,” Paper Delivered to the Panel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English School: Close or Reconvene?” BISA Conference, Manchester, December 1999.

註⑬ Thomas Diez, Richard G. Whitman, “Analyzing European Integration: Reflecting on the English School: Scenarios for an Encounter,”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0, No. 1（2002）. Jacek Czaputowicz,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ts Approach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Studies and Analyses*, Vol. 2, No. 2（2003）.

airiti



除了研究議題趨同外，國關英國學派在方法論上採用的折衷主義（Eclecticism），⑭重視歷史知識、價值判斷與理念的作用，強調行爲者的能動性，以及不斷納入新的研究議題等特質，同樣展現在之後的國政經不列顛學派當中。⑮（參見表 1）差別在於，相對於國關英國學派是指稱一種以「國際社會」作爲核心概念的特定理論，而國政經不列顛學派則是採用批判立場的理論群統稱，受到馬克思主義較深的影響，底下還存在著新葛蘭西主義（Neo-Gramcianism）、女性主義（Feminism）和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等不同理論。⑯

**表 1　國際關係英國學派與國政經不列顛學派比較**

| | 國際關係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 | 國政經不列顛學派（British School） |
|---|---|---|
| 學派別稱 | 國際社會學派 | 歐洲學派（European School）、義大利學派（Italian School）、新國際政治經濟學（New IPE）、全球政治經濟學（Global IPE）、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Critical IPE） |
| 代表性學者 | 曼寧（Charles Manning）、懷特（Martin Wight）、布爾（Hedley Bull）、布贊（Barry Buzan）、瓦森（Adam Watson）、文森（R.J. Vincent） | 史翠菊（Susan Strange）、考克斯（Robert Cox）、舍尼（Philip Cerny）、吉爾斯（Barry K. Gills）、希寇特（Richard Higgott）、培蘭（Ronen Palan）、辛克萊爾（Timothy Sinclair） |
| 思想淵源 | 洛克（John Locke）、康德（Immanuel Kant）、格勞秀斯（Hugo Grotius） | 維科（Giambattista Vico）、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柯林烏（R.G. Colliwood）、馬克思（Karl Marx）、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葛蘭西（Antony Gramsci）、博蘭尼（Karl Polanyi）、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 |
| 學派共性 | 「國際社會」作爲主要核心概念和分析起點 | 批判性立場（批判既存的國際政經秩序以及主流國政經的方法論） |
| 研究對象與方法論 | 以主權國家、國家體系爲主要研究對象，物質／理念本體論，採用理性主義、⑰傳統主義⑱與整體主義⑲的方法論，強調秩序的價值 | 以國家／社會複合體、全球結構爲分析對象，實踐本體論，採用歷史主義與折衷主義的方法論，質疑秩序的穩定價值 |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註⑭　國關英國學派就是以理性主義的國際社會理論，來調和現實主義關於無政府國際體系的衝突悲觀論，以及自由主義的人類善性與合作傾向的樂觀論立場。

註⑮　Hedley Bull,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World Politics*, Vol. 18, No. 3（1966）, pp. 361~377.

註⑯　Robert O’Brien and Marc Williams,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Evolution and Dynamics*（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 21~25.

註⑰　國關英國學派的理性主義研究途徑與新現實或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理性主義途徑不同，前者強調的是一種實踐理性，即國家間會經由認知學習的社會化互動過程，體認到共同的利益或分享的價值，進而形成共同的行爲規範；而後者重視的是工具理性，認爲每一國家爲了追求權力或利益，均會依據成本－效益分析來決定行爲，只不過新現實主義考量的是「相對利得」（relative gain），而新自由主義計算的是「絕對利得」（absolute gain）。

註⑱　二戰後 50、60 年代，社會科學興起行爲主義研究途徑，主張應研究可被觀察的行爲，保持價值中立，並採用量化或模型建構的研究方法。面對此挑戰，傳統主義堅持以人類理解、價值判斷、規範作用和歷史知識作爲研究的基礎。

註⑲　整體主義是一種社會學方法，和經濟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相對。前者強調社會現實同個體一樣都是眞實的，主張社會生活研究應從社會整體的觀點出發，認爲溝通、認知與學習是社會秩序的必要組成部分；而後者則是將個體作爲分析社會現象的起點，所有對社會現象的分析都可化約爲對個體性質的描述。

airiti



至於國政經不列顛學派的稱號由來，同樣也沒有學者將其說明清楚。該學派的成員並沒有共同的學術發源地，且不限於英國籍或居住在英國的學者，雖然是以其爲主，但仍包括一些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大英國協的學者。例如，該學派的關鍵人物－考克斯是加拿大裔；舍尼（Philip Cerny）是美國人；吉爾斯（Barry K. Gills）具有英、美兩國的公民資格；希寇特（Richard Higgott）則有英國和澳大利亞雙重國籍；培蘭（Ronen Palan）同時擁有以色列和英國的護照；而辛克萊爾（Timothy Sinclair）則是來自紐西蘭。這可能是該學派稱爲 British School 的重要原因，British 是指涉範圍較大的不列顛、大英國協或之前大英帝國的統轄區域，這樣的稱呼或許也比較容易將其與國關的 English School 作區隔。更爲重要的是，某位學者是否屬於不列顛學派，不是依國籍而是以其研究立場而定。

不列顛學派不是一開始就刻意去推動或命名的，而是一些學者陸續針對國際政治經濟問題的分析與解決，而逐漸形成的學術社群團體。毫無疑問，不列顛學派能夠創立與發展，並取得與美國主流學派競爭的地位，英國史翠菊（Susan Strange）教授在其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1971 年，她在英國的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內設立國際政治經濟學小組（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Group），1974 年該團體加入她與巴肯（Alistair Buchan）共同推動成立的英國國際研究協會，成爲該協會常設性的研究工作小組。除了從行政組織上推動英國國政經的研究貢獻外，史翠菊早在 1970 年於〈國際經濟學與國際關係學：一個相互忽視的案例〉一文中就明確指出，應當從政治與經濟相互影響的角度來研究一系列重大的國際政治經濟問題，同時主張改革傳統國際關係學與國際經濟學將政治與經濟研究過度分工的作法，強調應多方吸取道德哲學、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史學等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避免用過度量化的簡單模型去解釋，或武斷地預測未來複雜的國際事務，這篇文章可以視爲是國政經這門新學科的成立宣言。⑳不過，史翠菊當時並沒有要創立一個新學派的意思，其甚至偏好將自己定位爲獨立的新聞評論員（independent journalist），而非學者或理論家，她在意的是能否提出思考問題的新概念、方法或框架，而非去發展一個國政經的系統性理論。㉑史翠菊後來陸續提出「結構性權力」（structural power）來取代傳統國關重視的「相對性權力」（relative power）概念；㉒反對國政經研究持所謂「價值中立」的立場，鼓勵研究者應多關心既存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底下「誰獲益？」（Who benefits？）的問題；㉓反對主流國政經的「國家中心主義」（state centrism）㉔與「經濟

---

註⑳ Susan Strange,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of Mutual Neglect,” pp. 304~315.

註㉑ Benjamin J. Coh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p. 50~51.

註㉒ Susan Strange, “The Eclectic Approach,” in Roger Tooze, ed., *New Political Economy*（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1991）, p. 35.

註㉓ Susan Strange, “Structure, Value and Risk in the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Barry R.J. Jones, ed., *Perspective on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Francis Pinter Publishers, 1983）, p. 221.

註㉔ Susan Strange,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71~172.

airiti



學帝國主義」(economic imperialism) 研究立場；㉕以及主張國政經不是國關的次學門領域，國政經應爲一新的獨立研究領域，甚至可以包含國際關係，這些概念或主張都影響後來不列顛學派的發展。(參見表 2)

## 二、不列顛學派的思想與名稱淵源

如上所述，不列顛學派是一理論群的統稱，因而其思想淵源非常龐雜。艾伯特 (Jason P. Abbott) 和沃斯 (Owen Worth) 就認爲，作爲批判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不列顛學派，至少由三個學術傳統所構成：一是馬克思主義；二是熊彼特 (Joseph A. Schumpeter)、博蘭尼 (Karl Polanyi) 以及後凱恩斯主義傳統；三是後結構主義 (Post-Structuralism)。㉖毫無疑問，不列顛學派內部以考克斯 (Robert Cox) 所創立的新葛蘭西主義 (Neo-Gramscianism) 最受到矚目，甚至常將其和不列顛學派畫上等號。不過考克斯倒是認爲，稱爲 British School 不甚精確，而是可以稱爲「European School」，因其思想淵源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紀初期那布勒斯 (Naples) 歷史方法學者維科 (Giambattista Vico)、十九世紀德國浪漫主義 (German Romanticism) 與義大利歷史理論家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以及二十世紀前半葉英國歷史哲學家柯林烏 (R.G. Colliwood) 等人的思想。㉗這個知識傳統和早先十七世紀法國哲學家笛卡爾 (Ren'e Descartes) 的歷史理念有著明顯的分歧，後者主張歷史學不論多麼有趣和富有教育意義，也不論對人們生活實踐態度的形成有何影響，都不可能是眞理，因爲它所描述的事件從來都不是像它所描述的那樣發生。換句話說，笛卡爾懷疑歷史學的價值 (歷史懷疑主義)，他並不認爲歷史學可以是知識 (knowledge) 或科學 (science) 的一個組成部分。㉘十八世紀歐洲啓蒙運動以及十九世紀隨著歐洲在全世界擴張的進步觀念 (the idea of progress)，多少都受到笛卡爾知識觀的影響，認爲現代科學將提升人們支配自然的力量，而科學方法，非歷史方法，才是理解世界的途徑。㉙

相對地，不同於笛卡爾主義的歷史觀，維科指出某一個事物是否能夠被認識在於其已經被創造出來，且取決於它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㉚物理世界 (physical world) 是由上帝所創造，因此唯有祂才能完全理解，人們只能從外在觀察其運作的規律來接近對大自然的眞實知識。如同上帝一樣，歷史 (對維科而言指人類社會和制度的產生與發展過程) 是過去人類爲了追求其生活目標而創造的，因而是可以被人們的心智所理

---

註㉕ Susan Strange,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5), pp. 167~168.

註㉖ Jason P. Abbot and Owen Worth, ed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p. 1~6.

註㉗ Robert Cox, "The 'British School' in the Global Context,"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14, No.3 (2009), p. 320.

註㉘ R.G. Collingwood and Jan van der Dussen, eds., *The Idea of History: With Lectures 1926-1928*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94), p. 59.

註㉙ Robert Cox, "The 'British School' in the Global Context," p. 317.

註㉚ R.G. Collingwood and Jan van der Dussen, eds., *The Idea of History*, p. 64.

airiti



解，尤其是被那些能夠在腦子裡重行建構創造過程的人所掌握，歷史學家無疑就是最能勝任此項工作的人。㉛這種將自然知識（knowledge of nature）與歷史知識（knowledge of history）予以區別，但認爲兩者同爲科學知識的作法，在十九世紀德國的思想家中相當普遍。狄爾泰（Wilhelm Dilthey）就認爲兩者爲了各自的研究目的，分別採行同樣有效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與歷史理解（historical understanding）方法。科學知識或實證主義是研究者試圖從外部來了解出現於面前的現象，而歷史知識的取得是歷史學家能夠對研究對象進行內在的體驗，亦即歷史學家以「同情理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的方法去體會過去歷史人物內心的想法，去感受歷史事件深層的發展脈絡，如此才能逼近眞正的歷史。㉜

幾乎同一時期，義大利學者克羅齊放棄德國浪漫主義有關歷史學也是科學知識的堅持，認爲歷史是與自然根本不同的東西，每個新時代都會產生對過去的新觀點，因而取得一個新的歷史觀作爲理解現在的工具，就此意義而言，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all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㉝此外，克羅齊認爲每個存在於特殊社會與變動情境中的個體，對過去歷史的理解是一種個人化的關係（personal relationship），這和強調非個人化的客觀實證邏輯不同。㉞這個思潮後來在英國由柯林烏加以申論，其區分「事實」（fact）與「資料」（datum）兩個不同的概念，資料是給定的，可從外在觀察並加以蒐集及分類；而事實則是被製造出來的，必有一製造者且唯有通過該製造者的心靈才能加以理解。實證科學就是講求資料數據，而史學則在於經由探求事實來理解未知的事物，因而也是一種科學研究。㉟

總之，源於西方這種二元論的思想傳統，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知識形式與理論目的，即實證主義與歷史主義（historicism）。實證主義指的是用物理學等的自然科學方式來理解社會科學，嚴格遵守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分立，並提出系統的與因果關聯的去歷史（ahistorical）解釋。㊱相對地，歷史主義相信人爲的制度是所有的人一起參與建立的，人類與物質環境的互動會產生主體間的共享觀念（intersubjective ideas），政治或社會制度就是人類集體對物質環境所做的共識回應。㊲同時，人性以及人類互動的結構並非固定不變，而是會歷時不斷地改變，歷史就是它們改變的過程和顯現。㊳

不同於美國主流國政經研究建構去歷史的共時性簡約理論，不列顛學派一般較重

---

註㉛ Robert Cox, “The ‘British School’ in the Global Context,” p. 317. R.G. Collingwood and Jan van der Dussen, ed., *The Idea of History*, p. 65.

註㉜ R.G. Collingwood and Jan van der Dussen, eds., *The Idea of History*, p. 172.

註㉝ R.G. Collingwood and Jan van der Dussen, eds., *The Idea of History*, p. 202.

註㉞ Robert Cox, “The ‘British School’ in the Global Context,” p. 317.

註㉟ 柯林烏，陳明福譯，**歷史的理念**（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4 年），頁 11~12。

註㊱ Robert Cox, “Realism, Positivism and Historicism,” in Robert W. Cox and Timothy J. Sinclair, eds.,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6）, pp. 51~53.

註㊲ 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42.

註㊳ Robert Cox, “Realism, Positivism and Historicism,” p. 51.

airiti



視擷取歷史知識與注重歷史證據，論證過程是依靠研究者的常識、直覺與判斷力，而非嚴格的驗證程序，因此該學派的研究旨趣是理解、闡釋與規範，而不是經驗檢證或做預測。不列顛學派對科學主義或實證主義方法論持保留態度，就是來源於上述反笛卡爾主義的傳統。除柯林烏外，維科、狄爾泰與克羅齊等均非英國或不列顛人，因而從思想淵源上來說，國政經不列顛學派亦可稱爲「歐洲學派」(European School)。

除了亦可被稱爲歐洲學派外，不列顛學派中的代表性理論－新葛蘭西主義（有時兩者被等同起來)，其淵源不僅來自於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本人，也可追溯到克羅齊或者更早的維科及馬基維利（Nicolo Machiavelli）那裡，由於這些思想家皆爲義大利人，因而國政經學者吉爾（Stephen Gill）就稱新葛蘭西主義爲「義大利學派」（Italian School)。㊴國政經不列顛學派存在著 British School、European School 與 Italian School 等不同的稱呼，就可見其比國際關係英國學派更爲龐雜，難以定位清楚。從國政經美國學派的角度來看，或許顯現出這是一個尚未成熟的研究領域，但對不列顛學派而言，多元開放正是該學派堅持的目標。

## 參、「全球政治經濟學」(GPE) 取代「國際政治經濟學」(IPE)

美國國政經研究在七〇年代至八〇年代中期這段期間，由於受到主流國際關係學者的主導，如新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理論和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都是採行「國家中心」的研究本體論。雖然，基歐漢（Robert Keohane）與奈伊（Joseph Nye）在七〇年代提出的相互依賴理論（Interdependence Theory）強調非國家行爲者（non-state actors）的角色，但基歐漢於八〇年代建立的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卻明顯地又回到以國家作爲主要的分析對象，承認非國家行爲者仍是隸屬於國家，或者與國家相比是處於較次要的地位。㊵另一位美國國政經代表性學者吉爾平（Robert Gilpin）在 2001 年**全球政治經濟學：理解國際經濟秩序**（*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2001*）一書中，更直接表明其是「國家中心」的現實主義者。㊶

### 一、國家中心主義及其限制

美國學派所採行的「國家中心主義」(state-centrism) 研究方式，其主要內涵和局

---

註㊴ Stephen Gill, "Epistemology, Ontology and the Italian School," in Stephen Gill, ed., *Gramsc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3), pp. 21~48.

註㊵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 8.

註㊶ 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5~16.

airiti



限性包括：

1.國家中心主義認爲國家是國際體系中最重要的行爲者，擁有最多的權力與財富資源，縱使在全球化時代國家或許需要調整其功能以爲因應，但其角色並不可能完全被其他的行爲者所取代。如此，國政經對其他超國家行爲者（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歐盟與世界貿易組織等）、次國家行爲者（如城市與地方區域）或者非國家行爲者（如 NGO、恐怖組織與國際社會運動等）的行爲就沒有給予相等必要的關注。這樣，國家中心主義就難以想像美國在九一一所遭受的攻擊竟然不是來自於另一個主權國家，而是沒有占據固定領土的恐怖分子組織。

2.國家中心主義將國家視爲理性合一的整體，此有兩種不同的思路：一，將國家視爲「經濟人」會去極大化客觀存在的國家利益。這和早期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國家觀點一致，認爲其會利他地去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包括公共財、外部性與獨佔寡占等，以提升國家的總體福利。二，依循國家主義（Statism）的觀點認爲，國家處於國際體系與國內社會的特殊中介位置，不僅對內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權，同時還可在國際上運用暴力以保護國內社會。國家非如馬克思主義所言，僅是統治階級的工具或服務於資本主義的生產結構，而是基於國家安全的需求，使其具有相對於國內社會的決策自主性。㊷這兩種觀點後來分別爲新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及新國家主義（Neo-Statism）所修正，前者認爲國家是由一群追求私利的政治領導者和官僚組成（如尋租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而後者主張國家必須鑲嵌於社會，不能僅強調國家爲一獨立的行爲者（independent actor），以致於忽略了其必須和社會協調才能眞正取得決策自主性與執行政策的能力。

3.國家中心主義意謂著國家擁有相對於國內社會高度的決策自主性，其研究較重視體系層次分析，認爲國家的對外行爲主要是受制於國際體系結構，而後者則是由國家間不同的權力分布狀態所形成，可能是單極、兩極或者多極體系。這種研究頂多回溯到國家間的權力大小作比較，而較少論及國家與國內社會間的互動關係如何影響國家的對外行爲。然而，國政經很大一部分是處理國際經濟問題，國家的任何對外經濟政策都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國內不同階級或團體的利益，所以國政經研究如果偏好國家中心主義，而忽略國家與國內社會互動關係的考察，必然會有解釋上的局限性。美國國政經自八〇年代中期以來發展的「雙層博弈」（Two-Level Game）㊸和「社會聯盟」（Social Coalition），㊹以及九〇年代以來更快速推進的「開放經濟政治學」（Open

---

註㊷ Theda Skocpol,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 the State Back I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5）, p. 20.

註㊸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1988）, pp. 427~460.

註㊹ Ronald Rogawski, "Political Cleavages and Changing Exposure to Tra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1, No. 4（1987）, pp. 1121~1137.

airiti



Economy Politics, OEP）⑮等研究，就是將國家與社會或社會不同行爲者間的互動納入討論，來解釋國家的對外經濟行爲。

4.國家中心主義的「國家」主要是指西方霸權國家、次強權國家或者是已開發的資本主義國家，而研究議題則是偏向於處理這些國家間所面臨的經濟合作與衝突問題。例如，霸權穩定理論、相互依賴理論和新自由制度主義主要都是在處理西方核心國家間的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貨幣、對外援助、跨國投資以及能源危機等所謂的「低階政治」議題。⑯相對地，亞、非及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或開發中國家所面臨的階級剝削、貧窮、種族衝突、性別歧視、環境生態破壞與後發展困境等問題，則較少受到關注。這種忽略不僅會對當代全球政治經濟問題缺乏全面的了解，也會忽視不同國家在面對這些問題時的相異過程，甚至誤以爲西方過去的經驗就能解決非西方社會的當前問題。

## 二、全球政治經濟學的興起

隨著冷戰的結束，全球化進展並非對所有的國家、企業和人民均帶來正面的或者公平的好處。⑰國家主權是否必然衰退也仍是個爭議的問題，不過國家必須調整其行動的手段和目的以爲因應是毫無疑問。甚且，全球化現象不僅存在於經濟領域，其也作用於政治、社會以及文化各個層面，因而光是新古典經濟學或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並不足以解釋當今的全球化現象，必須綜合其他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來提出新的分析方法以解決問題。這就促使一些國政經學者重新思考「國家中心主義」，並以「全球政治經濟學」（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簡稱 GPE）來取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科稱

---

註⑮ 「開放經濟的政治學」這個詞最初來源於 Robert H. Bates, *Open-Economy Politic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ld Coffee Trad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一書。 美國學者萊克（David Lake）借用此概念來指稱一種國政經的特殊研究方式。簡單來說，「開放經濟的政治學」採用新古典經濟學與國際貿易理論的一些基本假設，同時在分析中加入政治變數，可說是在經濟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之間搭起了融合研究的橋樑。它將公司、產業部門或生產要素做爲分析單位，分析它們在國際經濟中由於經濟政策的調整如何導致其利益的變化，國際和國內制度又是如何匯集它們的利益，以及行爲體怎樣在國內和國際不同層次的談判和戰略互動中分配利益。

註⑯ 霸權穩定論認爲，國際自由經濟秩序的出現和發展有三個前提，即霸權國家願意提供國際公共財（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主要國家均支持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而且霸權也願意和其他次強權分享利益。參見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John G.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1982）, p. 384. 此外，基歐漢與奈伊的互賴理論基本上是關於核心國家間的利益討論，如海洋與貨幣領域的建制問題，以及美國與加拿大或澳洲的雙邊關係。參見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77）, part II and III. 同樣地，基歐漢的新自由制度主義研究在**後霸權**（*After Hegemony*）一書中所舉的例子也是如此。參見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註⑰ 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haps. 6-7.

airiti



謂。不過，美國學派與不列顛學派對於什麼是「全球政治經濟學」卻有不同的看法與期待。

美國學者吉爾平在 2001 年出版的**全球政治經濟學：理解國際經濟秩序**，就採用 GPE 而非 IPE 作爲書名，這和其 1987 年的**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87*）形成鮮明的對比。然而，吉爾平在該書中仍限於處理金融、貨幣、貿易、跨國投資、經濟發展與區域整合等國際經濟關係議題，只是以「全球經濟」（global economy）取代「國際經濟」（international economy）作爲研究對象，㊽並且介紹三種對新古典經濟學進行修正的理論，包括新內生成長理論（New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與新策略貿易理論（New Strategic Trade Theory）。做爲一個堅持「國家中心」的現實主義學者，吉爾平在本書中特別強調這些新經濟理論中的政治意涵，尤其是國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吉爾平認爲民族國家（nation-state）不論在國內或者國際的經濟事務中，依然會是個主要的行爲者，㊾顯然這種立場仍是傳統主流的研究方式。事實上，新內生成長理論、新經濟地理學與新策略貿易理論等也可能涉及階級剝削、貧窮、種族衝突、性別歧視、環境破壞與後發展困境等問題，只是吉爾平在該書中對此著墨並不多。

另一美國學者基歐漢則認爲，爲了回應經濟全球化應該打開國家這個「黑箱」（black box），推動國際體系與國內分析層次的結合研究，將國內政治經濟結構變遷的原因從國際經濟體系中來分析，相反地，也必須將國際經濟秩序的發展納入到（大國）國內對外經濟決策的政治過程來理解。㊿雖然已經修正了「國家中心」的偏好，不過基歐漢等美國主流學者將國際政治經濟學（IPE）與比較政治經濟學（CPE）結合所形成的全球政治經濟學（GPE），51仍然集中於討論國際經濟關係，並且主要是以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來分析核心國家的對外經濟決策。52類似地，美國學者奧特利（Thomas Oatley）也將重商主義、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視爲國政經的傳統學派（Traditional Schools of IPE），而主張當今應重視探討全球經濟中（主要包括國

---

註㊽ 「國際經濟」指每個國家內部都存在著一個國民經濟（national economy），國際經濟活動主要就是在這些國民經濟之間發生，國際貿易在各國的公司間進行，而國際金融交易的首要功能是爲貿易提供服務。相對地，「全球經濟」指跨國公司在不同國家建立生產線從事商品生產，公司內貿易占國際貿易很大的比重，多媒體、娛樂公司、國際銀行和國際控股公司等高度非領土化公司興起，以及全球金融市場的出現等。

註㊾ 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 4.

註㊿ Robert O. Keohane, “The Old IPE and the New,”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No. 1 (2009), pp. 34~46.

註51 比較政治經濟學（CPE）比 IPE 大約晚十年左右興起（七〇年代末期），其研究重點是從比較不同國家或同一國家不同時期的政府、社會與市場的互動關係，來探討國家如何管理國內經濟事務，進而歸納出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參見朱天飆，**比較政治經濟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7。

註52 Robert Keohane, “The Old IPE and the New,” pp. 34~36.

airiti



際貿易體系、國際貨幣體系、跨國公司與經濟發展等四個議題領域），國內社會的利益、偏好或觀念如何透由與政治制度的互動，來影響國家對外經濟政策的選擇。㊸簡言之，基歐漢及奧特利的觀點認爲，爲了回應全球化的發展，注重國內層次與理性選擇研究是美國國政經的新趨勢，亦可稱其爲「新國際政治經濟學」（New IPE）。㊹

相對地，國政經不列顛學派對 GPE 的定位不僅是研究議題範圍的擴大，或者行爲者（包括超國家行爲者、非國家行爲者與次國家行爲者）與分析層次（包括全球、區域、國家／社會與個人）的增加，也涉及研究概念、理論與途徑不斷地推陳出新。早在 1988 年吉爾（Stephen Gill）和羅（David Law）兩位學者就將其教科書式的專著稱爲**全球政治經濟學：觀點、問題和政策**（*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Problems, and Policies, 1988*），除了討論國政經三大研究傳統外（自由主義、經濟民族主義、馬克思主義），該書還特別提出公然的（overt）、隱藏的（covert）和結構的（structural）等三種不同面向的權力概念，㊺以及比較現實主義和葛蘭西兩種不同的霸權觀（two concepts of hegemony），以補充美國學派聚焦於物質性的權力觀與物質性的霸權觀之不足。此外，書中還討論了全球化、生態危機、道德倫理以及國際能源等當時美國國政經學者較少處理的問題，可以說此書是國政經不列顛學派關於研究議題與理論的初步構想。之後，在培蘭（Ronen Palan）2000 年編的**全球政治經濟學：當代的理論**（*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ontemporary Theories, 2000*），2004 年歐布萊恩（Robert O'Brien）與威廉斯（Marc Williams）合著的**全球政治經濟學：演化與動態發展**（*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Evolution and Dynamics, 2004*），拉范希爾（John Ravenhill）2005 年編的**全球政治經濟學**（*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2005*）以及史督伯斯（Richard Stubbs）與安德希爾（Geoffrey R.D. Underhill）2006 年合編的**政治經濟學與變遷中的全球秩序**（*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 2006*）等 GPE 專書中，㊻都可以看到新的研究議題、理論或方法論不斷地被提出來。一般而言，不列顛學派的 GPE 呈現出幾個主要的特色：

---

註㊸ Thomas Oatle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Global Economy*（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6）, pp. 8~14.

註㊹ Robert Keohane, "The Old IPE and the New," pp. 36~40.

註㊺ 權力的第一面向指，A 使 B 做其本來不願意做的事，就是 A 對 B 行使權力，通常爲物質性力量；第二面向的權力運作指，行爲者透過決策程序的操縱控制，將決策的範圍局限於對自己有利的議題，如此可抑制社會中想改變現行利益或特權分配方式的要求，將這些要求封殺於進入決策過程之前；第三面向的權力運作是指，權力關係可能存在於行爲者主動影響、塑造或決定其他行爲者的偏好，也可能存在於整體系統偏差的動員、再造與強化之中。

註㊻ Ronen Palan, 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ontemporary Theories*（London: Routledge, 2000）. Robert O'Brien and Marc Williams,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Evolution and Dynamics*（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John Ravenhill, 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Richard Stubbs and Geoffrey R.D. Underhill, eds.,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airiti



### （一）分析層次的多元

不列顛學派的 GPE 試圖打破美國學者偏好的「體系層次」與「國家中心」的研究。譬如，史翠菊認爲現今全球化時代的權力已明顯地由國家向市場，進而向非國家權威轉移，同時過去強調領土主權作爲利益單位的思維方式，已無法涵蓋目前全球體系所發生的問題，如金融風暴、地球暖化、禽流感病毒、恐怖主義與毒品走私等，這些危害的不會是特定的國家，而是攸關全體人類的生存問題。面對這樣的發展趨勢，國政經應該以人而非國家爲研究核心，關心整體人類生存的基本價值問題，這樣才能回應當前全球體系結構的變遷。[57]又如，以考克斯爲首的新葛蘭西主義主張，物質力量、理念和制度三者的實踐活動構成了特定的歷史結構，而此歷史結構進而影響了社會力量（social forces）、國家形態（forms of state）和世界秩序（world orders）三者間的辯證互動關係。[58]

### （二）研究議題的擴大

從 IPE 發展爲 GPE，不列顛學派探討的議題不斷地擴大，包括階級、性別、種族、貧窮、環保、人權與全球化等，超出了美國學派傳統注重的國際經濟關係範疇。這些議題是彼此密切關聯的，他們相互決定了本身的性質，並且共同界定了現代 GPE 所要研究的知識領域。對這些議題領域的研究原本是散在各個不同的學科，沒有任何一項是專屬於 GPE 的，這使得 GPE 必然是一種跨學科的開放領域（open range）研究。正如 GPE 學者帕藍所言，它是一個「四周有邊境」（frontiered），而不是有明確「界線」（boundary）的學科。[59]這和史翠菊早先主張國政經研究應像美國西部大草原一樣，開放給所有勇於嘗試的移民者開墾，前途充滿著各種可能性和希望，而不應搞學術圈地運動的說法類似。[60]

### （三）理論的跨學科發展

相對於美國學派以自由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等三大研究傳統來探討國際政治經濟問題，或借用新古典經濟學的概念或模式來分析國際經濟關係（如霸權穩定理論的「公共財」或新自由制度主義的「交易成本」概念），不列顛學派的 GPE 近來也興起一些新的理論，如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新葛蘭西主義（Neo-Gramscianism）、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建

---

註[57] Susan Strange,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71~172.

註[58] 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17~239.

註[59] Ronen Palan, 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 2.

註[60] Susan Strange, ed., “Preface” in *Path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Press, 1984）.

airiti



構主義（Constructivism）、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女性主義（Feminism）與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等，這些理論的提出通常都是跨學科的研究成果。例如，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Feminist IPE）除了延續女性主義國關（Feminist IR）的研究外，近來更是結合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Feminist Political Economy），將性別因素納入「發展」與「全球化」的議題討論當中。[61]

## （四）批判的研究立場

不列顛學派的 GPE 研究大都是持批判的立場，強調行爲者（agent）在結構制約下的能動性，重視思想（ideas）在建構全球政經秩序的重要性，與反對歷史發展的規律性，主張不可預測性的歷史主義態度。如前所述，美國主流國政經研究主要受到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影響，因而將市場「均衡」的概念轉爲注重國際體系的穩定或秩序價值，當國際體系出現不穩定的現象時，美國學派就會提出相對應的理論以求恢復秩序，如七〇年代的霸權穩定、八〇年代的新自由制度主義與九〇年代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理論等。相對地，不列顛學派的 GPE 強調更應該關心在當前國際政經秩序底下是誰得到利益，以及全球秩序結構變遷的可能性問題，並以追求人類全體解放爲目標。

簡言之，從研究議題、分析層次與方法論來看，可以說不列顛學派的 GPE 其研究對象不僅是「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而是「全球領域」（global arena），[62]其獨特的學科定位不是透過某些共同的核心假設、概念或方法論來形成，而是比傳統國政經更重視與其他學科相互重疊之處的整合研究。[63]很顯然地，與美國的 GPE 發展情形不同，[64]不列顛學派的 GPE 不是國際關係的次學門領域（subfield），而是超越了和國際關係之間的關聯性，而與古典政治經濟學或其他社會人文學科更爲密切地融合。[65]（參見表 2）

---

註 61 Georgina Waylen, “You Still Don’t Understand: Why Troubled Engagements Continue Between Feminists and（critical）I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2（2006）, pp. 145~164.

註 62 Palan, 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 1.

註 63 *Ibid.*, p. 2.

註 64 例如 Guzzini 就認爲國際政治經濟學就是試圖對國際關係新現實主義再定義，參見 Stefano Guzzini,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Routledge, 1998）, Chap. 11.

註 65 Richard Higgott and Matthew Watson, “All at Sea in a Barbed Wire Canoe: Professor Cohen’s Transatlantic Voyage in I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5, No. 1（2008）, pp. 1~17.

airiti



表 2　美國學派與不列顛學派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比較

| | American School | British School |
|---|---|---|
| 學派別稱 | 哈佛學派（Harvard School）、國際組織學派（IO School）、新國際政治經濟學（New IPE）、<br>開放經濟政治學（Open Economy Politics） | 歐洲學派、義大利學派、新國際政治經濟學（New IPE）、⑥⑥全球政治經濟學（Global IPE）、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Critical IPE） |
| 本體論⑥⑦ | 物質本體、國家中心 | 物質／觀念本體、國家／社會複合體 |
| 認識論 | 經驗主義、實證主義 | 歷史主義、折衷主義 |
| 主要分析方法 | 經濟學（個體主義、形式模型、量化研究、理性選擇理論） | 歷史學、社會學、哲學、古典政治經濟學（詮釋、整體主義、質化研究） |
| 研究議題 | 國際經濟關係<br>（政策導向研究） | 多元議題 |
| 學科定位 | 國際關係次學門 | 超越國際關係學 |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 肆、為何是「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Critical IPE）？

不列顛學派的重要特徵是批判主流國政經的話語（discourse），即批判其談論和理解世界的特殊方式。⑥⑧有些是針對主流的概念或假設提出批判，有些則是質疑其方法論上的問題。以不列顛學派主要創始者史翠菊和考克斯來說，兩人的批判風格就不太一樣。

### 一、史翠菊的「結構性權力」批判概念

史翠菊主要是反對主流國政經的「國家中心」與傳統「相對性權力」觀點，⑥⑨指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是由包括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等四個結構所產生的權力共同組成，國家只在安全結構占主導地位，而在其他三個結構中跨國公司、金融機構和科技

註⑥⑥　墨菲和圖茲稱不列顛學派爲「新國際政治經濟學」（New IPE），以區別於之前美國學派所強調國家中心本體論和實證主義認識論的「正統國際政治經濟學」（Orthodox IPE），參閱註⑥。這和基歐漢主張可將美國八〇年代後期以來，結合國內分析層次與採用理性選擇分析方法的國政經研究，稱爲「新國際政治經濟學」（New IPE）不同。基歐漢的用意是要區別於之前美國主流所採行的國家中心和體系層次分析的「舊國際政治經濟學」（Old IPE），參閱註⑤⓪。

註⑥⑦　國關／國政經的本體論包含兩種內涵，一是探討國際關係的本質是由物質或觀念構成；另一則是指國際關係的最基本分析單位爲何。

註⑥⑧　有關「話語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理論與方法可參見 Marianne W. Jorgensen and Louise J. Phillips, *Discourse Analysis as Theory and Method*（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 1.

註⑥⑨　傳統的「相對性權力」概念是指，A 使 B 去做 B 原本不願意做的事情的能力，即 A 對 B 行使權力，這種權力觀較側重軍事物質力量。

airiti



專家才是具有支配性力量。⑩這種結構性權力和傳統的相對性權力概念不同，是一種跨越國界的非領土性（non-territorial）權力，是行爲者決定辦事方法或者據以行動的框架。但值得注意的是，史翠菊認爲全球體系結構不僅決定世界經濟（生產、交換與分配）是如何運作的，而且也是體現著人類對財富、秩序、自由與正義等四種政治價值的偏好選擇，不同社會對這些價值的側重程度或者組合方式是有差異的。⑪也就是說，體系結構並非如現實主義的無政府狀態概念一樣是外在給定的，而是一種人類實踐結果所形成的可變革結構，這種觀點接近於新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的「實踐哲學」或者考克斯的「歷史結構」概念。⑫不過，史翠菊此處所謂的「人類」是一廣義的說法，結構權力擁有者可以是國家以外的公司、社會組織甚或個人。她並沒有直接進行階級分析，如此就不能輕易將其與考克斯同歸爲馬克思主義學者。事實上，這正是其自承方法論上「折衷主義」的體現，⑬或許可稱其爲批判的現實主義者（critical realist）。

另一具爭議性的問題是，史翠菊未進一步說明四種結構權力間的內在互動關係，甚至出現前後相互矛盾的看法。當她在**國家與市場**（*States and Markets, 1988*）一書中建立結構性權力的一般概念時，先提及這四個結構是彼此互爲基礎的，沒有哪一個是具有優先性，⑭但之後當個別論及知識結構時，又認爲其變革會引發其他安全、金融與生產結構等的改變，以及當前各國主要是競逐知識結構的領導權，⑮這又好似認爲知識結構有著優先的基礎作用。⑯問題是，史翠菊的知識結構內涵是較偏物質性的，包括科學技術方面的知識，以及商標、專利或智慧財產權等，而不包括意識形態或主體間的共享知識（intersubjective knowledge），後者正是考克斯的新葛蘭西主義所強調的。如此，史翠菊既不像現實主義或依附論者以軍事力量或者生產分工作爲體系結構變遷的推動力量，也不像新馬克思主義者那樣強調意識形態的相對自主作用，如此她就沒能清楚解釋全球體系結構變遷的可能動力來源。雖然，後來史翠菊將國家、市場與技術視爲體系結構變化的決定性因素，但仍然沒有深入分析此三者是如何在結構權力框架內互動，以及是甚麼因素促使他們變遷和發展的。⑰這樣的局限性就反應在八〇年代學界關於美國國力是否衰退的論戰中，當時史翠菊以四個結構性權力來衡量，認爲美國僅是相對衰退而已，其仍是國際最爲強大的國家，只是沒有意願繼續承擔霸權的責

---

註⑩ Susan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London: Pinter, 1988）, p. 26.

註⑪ Susan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 p. 18.

註⑫ 簡單來說，葛蘭西的「實踐哲學」是指，所謂的"物質客觀性"是人類歷史具體實踐所創造的，是一種主觀與客觀的辯證統一，而不是外在給定的客觀。此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在塑造社會現實中的積極作用，人對社會矛盾的反思會產生主觀的反應，如果這種反應在主體間形成共識，那就是一種社會物質客觀性，它可以規範人的行爲與確定社會制度。參見葛蘭西著，中共中央馬列編譯局譯，**葛蘭西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頁 519。

註⑬ Susan Strange, "An Eclectic Approach," in Craig N. Murphy and Roger Tooze,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1）, pp. 33~40.

註⑭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 pp. 26~28, 31.

註⑮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 pp. 126~134.

註⑯ 李濱，「解讀斯特蘭奇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思想」，**國際政治研究**，第 3 期（2010 年），頁 180。

註⑰ Susan Strange, "An Electic Approach," pp. 39~40.

airiti



任。所以，七〇年代布列頓．森林金融體系（Breton Woods System）瓦解後所造成的國際金融失序，還有賴於美國致力恢復和護持。[78]史翠菊這樣的觀點雖然較能夠引起傳統國關或國政經學者的共鳴，也願意和其對話，甚至還曾被選爲美國「國際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的會長，但另一方面卻被考克斯等學者批評爲「親美」，[79]而回到了「問題解決理論」（Problem-Solving Theory）的學術立場。史翠菊的結構性權力分析框架相對於主流話語是具有批判意識的，但最終卻沒有發展出系統性的批判理論。[80]或許這是她一貫堅持的主張，國際政治經濟學應該是一種啓發思維的開放性方法，以及對人類生存條件的關懷方法，而不一定要急著去建構理論。[81]

## 二、考克斯的批判理論

相對於史翠菊，另一不列顛學派學者考克斯就更注重對批判理論的建構，其所創設的新葛蘭西主義常被認爲是「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Critica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之代表性理論，甚至直接將兩者等同起來。[82]從表面上來看，新葛蘭西主義之所以是「批判的」，乃因其依循馬克思主義傳統，批判既存國際政經秩序的不合理與不公正性，揭露和反思不公平性的由來，進而謀求人類的解放與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就理論層次而言，新葛蘭西主義是針對主流國政經的認識論與方法論（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尤其是前者）進行反思批判，因其正是掩護既存不公平的國際秩序，以及維護該秩序底下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這些批評包括：

1.新現實主義國關理論將國家視爲先驗存在的行爲主體，假設其爲理性合一的整體，並且享有相對於市民社會的絕對自主性。新葛蘭西主義則認爲，國際關係源自於社會生產關係，所以必須先考察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認識到不同歷史時期，甚至同一時代的國家，會因著不同的生產方式和積累結構而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同時，國家與市民社會並不是截然二分，而是進行相互建構的作用，形成一種國家／社會複

---

註[78] Susan Strange, “The Persistent Myth of Lost Hegemony: Reply to Miner and Sny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1（1987）, pp. 751~752.

註[79] Robert W. Cox, “Take Six Eggs,” in Robert W. Cox and Timothy J. Sinclair eds.,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86.

註[80] Christopher May, “Structural Strangely: Susan Strange, Structural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Stephen Chan and Jarrod Wiener, eds., *Theoriz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temporary Theorists and Their Critics*（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99）, p. 54.

註[81] Susan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 p. 16.

註[82] 有些學者主張不應將「新葛蘭西主義」與「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等同起來，因後者的範疇更爲廣泛，還包括博蘭尼（Karl Polanyi）、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以及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等人的思想傳統。參見 Jason P. Abbott and Owen Worth, “Introduction: The ‘Many Worlds’ of Critica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Jason P. Abbott and Owen Worth, ed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 6. 而且，一般認爲除了新葛蘭西主義外，國政經的批判途徑還包括女性主義、環境主義與建構主義。

airiti



合體（state-society complexity），共同構築了霸權的社會秩序。[83]雖然新現實主義學者吉爾平認爲，國政經就是試圖探討國際政經秩序中國家與市場的互動關係，但仍將兩者視爲分開且平行的領域，僅是外在地將兩者聯繫起來研究。[84]比較而言，新葛蘭西主義才是徹底消除了國家與市場的分離，認爲兩者不是各自獨立存在的實體，而是同一社會生產關係整體的兩個面向，這樣才眞正實現了國政經在本質上將國家與市場融合的研究。[85]

2.新現實主義認爲國際政治研究有兩個基本的特徵，即國際體系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以及國際結構制約著國家的對外行爲。新葛蘭西學派則明確地指出，這種簡單地區分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二元論，以及單向強調結構決定因素的研究是有問題的。[86]事實上，不能把國際體系看作是無政府狀態，因爲它是立基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中，並受其市場經濟運作的需要所規範。國際體系與世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之間，就如同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一樣，彼此是互爲建構的。同時，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也沒有本質上的差異，均是爲了某種特定生產方式的需要而存在，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遷會促使國家改變組織形態以爲因應，並進而形成新的世界秩序。簡言之，社會力量、國家形態以及世界秩序三者是處於動態的辯證關係。

3.新葛蘭西主義的「霸權」（hegemony）概念也與主流國關或國政經理論不同。新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理論認爲，霸權是指一個國家大體上能夠將其軍事物質力量與意志在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和外交各領域強加於其他國家身上，並且能夠及願意提供國際公共財（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以利自由國際經濟秩序運作的國家。[87]而採用馬克思主義研究取向的世界體系理論，其霸權概念同樣與國家權力密不可分，其關注的是相繼出現的國家霸權循環，從義大利的城邦國家轉到荷蘭、英國而後到今日的美國。[88]雖然世界體系論者也涉及到地緣文化與意識形態方面的討論，他們更多強調的是經濟層面的物質性霸權。[89]相對地，新葛蘭西主義則認爲霸權是一種關於秩序性質的價值結構和理解結構。[90]一個國家單是具有軍事或物質力量的支配地位並不足以保證能

---

註[83] 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05~206.

註[84]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0.

註[85] Geoffrey R.D. Underhill, “State, market,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genealogy of an（inter-?）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6, No. 2（2000）, p. 824.

註[86] 所謂二元論是將事務的某一現象或存在看成是由兩個完全不同的維度、概念或原則所構成，二者之間根本不可能互相轉換。

註[87] Robert Gilpin, 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pp. 161~162.

註[88] G. Arrighi and B. Silver,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註[89]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8.

註[90] Robert Cox, “Toward a Post-hegemonic Conceptualization of World Order,” in James Rosenau and Ernst-Otto Czempiel, eds.,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40.

airiti



建立起霸權，全球霸權（global hegemony）是來自於主導國家內的社會統治階級，他們所想和所做的獲得了其他國家統治階級的默許，[91]是核心與邊陲社會的跨國菁英分子結成聯盟，並且透過其所支配的全球政治經濟組織，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貿易組織（WTO）、聯合國、歐盟、二十二國集團（G-22）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等，與大眾傳播媒體和知識份子傳達特定的價值觀來實踐的，即形成歷史統治集團（historical bloc）。也就是說，霸權的運作是體現全球體系結構中有形的物質力量（material power）、無形的意識形態（ideology）與制度（institution）三者間的和諧和適應作用。[92]不過，這裡的制度和新自由制度主義從交易成本的概念出發，來討論國際間合作的制度不同，新葛蘭西主義主張國際制度是霸權世界秩序的產物，支持占優勢的生產方式之一般行爲準則，它的出現便於霸權的擴張與世界秩序的合法化保證。[93]如此，在後冷戰的全球化時代，國際關係研究該關注的不是美國是否依然爲霸權國家或轉變成爲新的帝國統治形式，或國際結構是否已從單極轉爲多極體系，而是更應該重視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新生產方式底下，崛起的跨國資本家階級如何透由其支配的國際政經組織，以及新自由主義（包括消費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來取得霸權地位。美國政府所扮演的領導者角色只不過是代表跨國統治集團，而非僅是爲了促進所謂的「國家利益」。

4.新葛蘭西學派駁斥主流社會科學知識，包括主流國際關係所強調的主、客體二元對立與價值中立的研究原則。考克斯主張，理論總是爲了某些人與某些目的而存在，它是某個支配利益集團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表達。[94]美國學者奧倫（Ido Oren）在其**美國與美國的敵人**（*Our Enemies and US: America'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3）一書中也呼應了這個觀點，指出美國的政治學是純粹從美國視角來考察歸納，是以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爲宗旨的學科。[95]事實上，社會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所有的理論都有其社會與歷史時空的背景脈絡，而主流研究所建立的普遍化通則會導致去歷史（ahistorical）的結果，而且其普遍理性（common rationality）的概念，即相信不同的人在面臨同樣處境時會做出相同或類似行爲的說法，也會造成「西方中心主義」（western centrism）的思維，無法理解甚至不尊重非西方社會對於國際現象或問題解決的看法。如此，主流國關理論就可能僅是爲既存的國際秩序背書，而忽略了各種權力關係在其中運作的結果所可能引起的支配與不公平現象，並且低估了反霸權力量（包括民族主義運動、社會主義團體以及文化社會運動等）推動全球社會與政治關係

---

註[91] Stephen Gill, *Gramsci, Hegemony and Materiali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64.

註[92] 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 pp. 205~212. Stephen Gill, "Epistemology, Ontology and the 'Italian School'," in Stephen Gill, ed., *Gramsc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5.

註[93] Robert W. Cox, "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ssay in Method," in Cox and Sinclair,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pp. 137~140.

註[94] Robert W. Cox and Timothy J. Sinclair,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pp. 85~87.

註[95] Ido Oren, Our Enemies and US: America'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airiti



變遷的可能性。[96]對考克斯而言，主流國關理論僅爲一種「問題解決理論」，謀求在給定的理論典範內解釋國際關係的運作和發展，強調維持國際政經秩序穩定的價值，並且主要是政策導向的研究方式。相對而言，新葛蘭西主義爲一「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主張應當去反思國際關係理論產生的源由與基礎，揭露既定的國際秩序是誰獲取利益，是怎樣被歷史社會力量所形塑，並從中去尋找能夠推動歷史變革的反霸權力量，最終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新世界秩序。[97]這是新葛蘭西主義強調爲何要以社會力量 (social forces) 作爲國際關係研究的分析起點，並且研究反霸權 (anti-hegemony) 運動與重新對過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遷作歷史考察的原因。

5.對於未來，新葛蘭西主義並沒有如傳統馬克思主義者那般，主張無產階級革命、民族國家必然消亡與實行公有計劃經濟制度。新葛蘭西主義的重點分析在於，從長時期的歷史來觀察資本主義的起源、發展與變遷，如何從國際勞動分工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演變爲當今跨越國界而生產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關注在這新的生產方式中跨國資產階級的興起與國家國際化 (或全球化) 的轉型現象，以及各種反霸權力量 (包括各種社會運動和反殖民運動) 的崛起等問題。可以說，新葛蘭西主義是主張對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必要的制約，以追求人類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從被宰制的環境中解放出來。同時，考克斯期待後霸權秩序不是另一個霸權國家的出現，而應是各種不同文明傳統並存，而且對於發展的價值和路徑的看法不是基於「西方中心」的觀點，而是經由不同文化間溝通交流與相互理解的過程中形成的。[98]這樣的觀點不同於美國學者韓廷頓 (Samuel Huntington) 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認爲後冷戰的世界秩序將會由早先美、蘇的兩極軍事對抗，轉爲不同文明間的衝突。[99]也不同於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在其歷史終結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 一書中所主張的，自由民主體制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將會是後冷戰的唯一秩序形態。[100]考克斯也觀察到，七、八〇年代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從福特式向後福特生產方式的轉變，不僅推動美國霸權秩序的演變，也促使歐洲國家思考如何重建新的身分認同與秩序。考克斯認爲，歐洲作爲一個整合的區域較美國或日本主導的經濟合作區域擁有更多正式與非正式的制度建構，因此歐洲或許可以被期待成爲後霸權以及後西伐利亞體系 (Westphalia Syatem) 時代，國際新秩序

---

註[96] 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Vol. 10 (1981), p. 128. 另一新葛蘭西主義者－佩吉奧 (Kees van der Piji) 認爲，從跨國階級形成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跨國的幹部階級或許代表轉變社會行爲與結構的潛在力量。Kees van der Piji, *Transnational Class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85), p. 165.

註[97] Robert W. Cox and Timothy J. Sinclair,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p. 90.

註[98] Robert W. Cox, "Structural Issues of Global Governance: Implications for Europe," in Stephen Gill, ed., *Gramsc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65.

註[99]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註[100]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2).

airiti



之實踐場所。⑩

## 三、新葛蘭西主義與國關批判社會理論的異同

新葛蘭西主義強調不同文化與不同社會群體間的相互了解，以及對於如何重建新的身分認同之重視，和林克萊特（Andrew Linklater）等人的國際關係批判社會理論（Critical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研究旨趣有點雷同。⑩林克萊特將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哈伯瑪斯（J. Habermas）對於理性的分類，即技術工具理性、戰略理性與道德實踐理性，拿來進行國際關係的研究。對其而言，馬克思主義理論由於重視社會生產力的歷史變遷作用，世界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發展，與人類可以經由科技控制自然環境等，因而被視爲是工具理性的代表。而現實主義國關理論傳統則與戰略理性密不可分，因其強調人類在實際或潛在的衝突情境下，總是思索如何掌握或控制他人，以求在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下追求國家利益（或權力）的極大化。相對地，道德實踐理性主張可以經由溝通學習來建構國際新秩序與社會公義。⑩此外，林克萊特認爲去國家中心化與重構世界主義的政治共同體組織形式，並不是烏托邦想法而是有實踐的可能性，問題在於如何聯結國家間的普遍性與差異性。一方面要超越主權國家的邊界去推動普世化的道德、政治與法律原則，並解構領土主權與公民身份之間的聯繫，將他國人民與本國人民同等看待，來擴展政治共同體的範圍。另一方面，重構現代國家認同，鼓勵各階級之間的對話，以及尊重文化、種族和性別的差異性，以此來深化共同體的內部合作發展。⑩以此爲基礎，林克萊特亦認爲歐盟的發展代表了一種進步的和解放的趨勢。

不過，新葛蘭西主義的批判理論和林克萊特的國關批判社會理論還是有所差別，前者主要是從經濟基礎或生產關係來分析社會的可能發展，並期待經由反霸權的社會力量來解放人類；而後者更關心對諸如文化、官僚體制與權力等社會本質的探討，主張重建理想的語境使主體間能自由溝通，發揮人類道德實踐的溝通理性，將其從技術工具理性和社會戰略理性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就方法論而言，新葛蘭西主義雖然強調意識形態對於社會變遷或歷史發展的作用，但也沒有完全要以「理念」取代「物質」作爲研究本體，或以「社會力量」取代「國家」作爲唯一的研究單位，而是主張一種理念與物質，社會力量與國家間互爲建構的辯證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而林克萊特則

---

註⑩ Robert W. Cox, “Structural Issues of Global Governance,” pp. 265~267, 283~286.

註⑩ 國際關係批判理論有廣義與狹義兩種界定，前者包括世界體系理論、新葛蘭西主義、社會建構主義、歷史社會學、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與國際關係批判社會理論等，反對主流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採行國家中心主義本體論與實證主義認識論的研究方法之總稱；而後者專指源於法蘭克福學派，尤其是哈伯瑪斯的批判社會理論，以林克萊特爲首的國際關係批判社會理論，和以考克斯爲首的新葛蘭西主義。參見 Fuat Keyman, *Globalization, State, Identity/Difference: Toward a Critical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97）, p. 98.

註⑩ Andrew Linklater, *Beyond Realism and Marxism: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 McMillian Press, 1990）, pp. 171~172.

註⑩ Andrew Linklater, *Beyond Realism and Marxism: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3.

airiti



是較爲強調觀念本體作用的後實證主義。(參見表 3)

**表 3 新葛蘭西主義批判理論與國際關係批判社會理論比較**

| | 新葛蘭西主義批判理論 | 國際關係批判社會理論 |
|---|---|---|
| 主要代表性學者 | 考克斯(Robert Cox)爲首，其他學者包括：吉爾(Stephen Gill)、羅賓遜(W.I. Robinson)、畢勒(A. Bieler)、莫頓(A.D. Morton)、貝科(I.Bakker)等。 | 林克萊特(Andrew Linklater)爲代表、其他學者包括：艾旭黎(R. Ashley)、霍夫曼(M. Hoffman)、紐菲德(M.A. Neufeld)等。 |
| 思想淵源 | 馬基維利(Nicolo Machiavelli)、克羅齊、柯靈烏(R.G. Collingwood)、維科(Giambattista Vico)、卡爾(E.H. Carr)、卡爾頓(Ibn Khaldun)、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博蘭尼(Karl Polanyi)、馬克思(Karl Marx)、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柏克(Edmund Burke)等。⑯ | 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尤其是哈伯瑪斯(J.Habermas)的思想。 |
| 研究方法論 | 歷史主義(historicism)、實踐本體論、辯證歷史唯物主義。⑯ | 後實證主義，觀念本體論，強調從規範的、社會學和人類行爲學等三大維度對國際關係進行詮釋研究。⑰ |
| 世界秩序變遷動力 | 形成反霸權力量 | 實踐溝通理性 |
| 未來理想社會 | 全球公民社會(global civil society) | 世界政治共同體(world political community) |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從上表可以看出考克斯和林克萊特的思想淵源不同，不過研究方法論都是質疑主流的實證主義與國家中心研究取向，重視歷史發展脈絡，支持社會必要的變遷，以及關心人類解放。

## 伍、結論：反思與啟示

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不列顛學派是一個非常龐雜且發展中的學術群體，內部存在著各式各樣的分支，研究議題超出了國際經濟關係，還包括對人權、種族、階級、性別、移民和環保等的關注，而研究方法論也不限於國家中心的本體論與實證主義的認識論，如此就很難對其作清楚的定位。本文只針對該學派爲何稱爲 British School？British School 和 English School 有何不同？又爲何該學派一些學者偏好以「全球政治經濟學」(GPE)取代「國際政治經濟學」(IPE)作爲學科的名稱？以及該學派的重要分支－新葛蘭西主義爲何被稱爲「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Critical IPE)？希望經由對這三大問題的討論能掌握國政經不列顛學派的內涵，以及區別出其與美國學派之間的差異。

---

註⑯ 有關考克斯思想淵源的詳細討論可參見 Anthony Leysens, *The Critical Theory of Robert W. Cox: Fugitive or Guru?*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Chap. 3.

註⑯ 考克斯並沒有完全拒絕實證主義，他認爲人類行爲的規律性是可能被觀察到的，因此，實證主義研究在特定的歷史範圍內是有益的。參見 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p. 244.

註⑰ Andrew Linklater, "The Question of the Next Sta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cal-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Millennium*, Vol. 21 (1992), p. 78.

airiti



當然，在本文討論的過程當中爲了凸顯不列顛學派的特色，常將美國學派的國政經研究作了簡單的化約，以方便比較或凸顯兩學派間的不同特色，其實美國學者內部同樣存在著差異。⑱例如，認爲美國（主流）學派的問題在於過於強調國家中心的本體論與實證主義的認識論，而這正是不列顛學派所反對的。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的美國學者都是採用這樣的一種方法論，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和柯瑞維奇（Peter Gourevitch）在八〇年代以前，就試圖融合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之研究，結合國際與國內的分析層次，以打開國家這個「黑盒子」(black box)。卡贊斯坦在1978年**權力與財富之間**（*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1978*）一書中，通過對國內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差異分析，來解釋美國、英國、日本、西德與義大利等五個不同國家，在類似的市場條件下，爲何會選擇不同的對外經濟政策；而柯瑞維奇則在同年的〈第二意象翻轉〉文章中，觀察國際經濟體系如何對國內結構和國內政策偏好的形成，發揮影響作用。⑲從認識論的角度而言，也不是所有的美國學者都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工具理性支持者。拉范希爾（John Ravenhill）就認爲，還可以將美國學派的理性選擇研究分爲強硬式（hard rational choice method）與溫和式（soft rational choice method）兩種不同的傾向。⑳卡贊斯坦和柯瑞維奇的研究屬於後者，採用較爲宏觀的比較歷史研究法，觀察國內「結構」的作用如何影響國家的對外行爲，或國際體系如何形塑國內偏好；而八〇年代中期以後，美國的「新國際政治經濟學」(New IPE）或「開放經濟政治學」(OEP）則是較接近前者，通常使用微觀的理性選擇方法，分析行爲者面對結構環境變遷時的調適行爲，注重偏好、利益與制度的互動關係研究。另外，少數的美國學者重視政治菁英或其代理人的觀念與認知因素的解釋力，如奧德爾（John S. Odell）關注個別決策者的主觀想法如何影響國家的對外行爲，而戈爾斯坦（Judith L. Goldstein）亦強調觀念在美國貿易政策與貿易制度的創立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㉑正如柯漢（Benjamin J. Cohen）所評論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美國學派雖仍把國家作爲基本的分析單位，但對其理解已不是早先現實主義的撞球模式了。㉒不過總體而言，國政經美國學派的理性主義研究還是遠多於認知或建構主義，這種差距甚至更大於在國際關係的研究中。

其次，如果跨大西洋兩岸的英、美學派能夠加強對話交流與學術研究合作，必有助於國政經的進一步深化發展，但問題是如何進行才能相得益彰？美國學派的特色是注重公共政策研究，強調理論是爲了解決問題，近來逐漸聚焦於國際經濟關係議題的

---

註⑱ John Ravenhill, “In Search of the Missing Middle,” pp. 18~29.

註⑲ Peter Katzenstein, ed.,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78）.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 4（1978）, pp. 881~912.

註⑳ John Ravenhill, “In search of the missing middle,” p. 25.

註㉑ John S. Odell, *U. 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Markets, Power, and Ideas as Sources of Chang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58. Judith L. Goldstein, *Ideas, Interests, and American Trade Policy*（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註㉒ Benjamin J. Coh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 137.

airiti



討論與採用理性選擇的分析方法。美國學派似乎可以從對岸學習多元學科（multidisciplinarity）的整合研究態度，除了經濟學之外，還可以引入歷史學、法律學、社會學、道德哲學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等之研究成果與多元途徑並存的批判研究立場，以免研究議程日益窄化以及形成「方法論單一文化」（methodological monoculture）的現象。⑰相對地，國政經不列顛學派的優點在於研究議題與方法的包容性，致力於宏觀體系轉型的探討，並思考如何讓世界能更爲美好，所以能不斷適時回應全球政經秩序演變所產生的問題，將之納爲新的研究議程以尋求解決。例如，當七、八〇年代主流學者認爲美國相對衰退，而提出霸權穩定論與後霸權的新自由制度主義時，不列顛學派的創始者史翠菊就能獨排眾議，以其四個結構性權力分析框架，說明美國國力並沒有衰退，而是短視追求私利並沒有意願承擔維持體系穩定的霸權責任。這種說法似乎較符合冷戰後美國持續一段時間的領導地位，尤其是能夠解釋小布希政府所實行的單邊主義、反恐戰爭或新帝國主義外交政策。而從新葛蘭西主義的角度來看，這種單靠強制的手段而不通過國際制度與尋求國際共識來領導的作法，最終將會導致美國霸權地位的衰落，這和近來美國主流學者奈伊（Joseph Nye）主張的軟實力（soft power）有異曲同工之妙。又如，英國的國政經主要期刊**國際政治經濟學評論**和**新政治經濟學**有許多篇文章討論近年來的全球金融危機問題，相對而言美國國政經的代表季刊**國際組織**就少有這方面的文獻。這或許是美國學派慣於新古典式的「局部均衡」分析，強調秩序穩定的價值，而不擅長探究整體結構的變遷動力問題。也或許是美國學派強調量化的實證研究和政策導向（policy-oriented）分析，兩三年的時間尚無法蒐集到足夠的跨國數據對全球金融危機進行深入的探討。反過來說，由於不列顛學派缺乏共同的理論基礎與採取方法論的折衷主義，因而被視爲長於論述或批判而弱於經驗檢證，甚至被批評爲「非科學」。⑱以新葛蘭西主義來說，其比主流簡約的國關／國政經理論更能貼近事實，就事實的描述或因果複雜關聯的說明而言是其強項。但因其採用多重因果的辯證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以及宏觀的全球體系結構分析，如此就失去了簡約性而無法對於未來的國際關係發展作邏輯上的演繹預測，僅能依過去或現在的經驗證據提出具說服力的趨勢推測，這必須研究者具備豐富的歷史知識、判斷力與足夠的資料佐證才做得到，此必定是一項非常辛苦的研究工作。這是採用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色，卻可能沒有作經驗檢證而被質疑其貢獻，或被批評爲各說各話而無助於學術研究的積累。不列顛學派最大的挑戰應該是思考能否用理性選擇的分析工具，對其所提出的議題或案例進行形式模型與量化研究，同時繼續保有該學派所堅持的「多元主義」研究特色，這樣或許才有可能和美國學派對話。當然，實際操作上要進行學派間研究的融合並不容易，這還有待國政經學界的努力，不過態度還是最爲重要，應該避免兩個學派間繼續相互忽視。畢竟，我們所處的生活世界是非常複雜的，

---

註⑰ Nicola Phillips, “The Slow Death of Plur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No. 1（2009）, pp. 85~94.

註⑱ Benjamin J. Cohen, “The Transatlantic Divide: Why Are American and British IPE So Differ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4, No. 2（2007）, pp. 197~219.

airiti



需要尊重從不同的角度或使用不同的方法所得到的理解。

最後，國政經不列顛學派的形成與發展可以給台灣學界帶來幾點的啓示：(一) 冷戰時期由於國際地緣政治因素以及特殊的兩岸關係，台灣過去對於具馬克思主義色彩的學術性研究較少，縱使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化時代，這種情況仍然沒有明顯改善。國內的國政經研究主要還是依循美國學術研究的脈絡，側重於新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論，或者新自由主義的複合互賴、國際建制、國際制度與全球治理等理論的探討，而對於國政經不列顛學派的新葛蘭西主義，或者其他的批判理論如歷史社會學、女性主義、環境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等則較少涉及。這種傾向也清楚反應在國內各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課程的上課參考書目，學生少有機會接觸到不列顛學派，當然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不多。雖然，有一些論文提到以史翠菊的結構性權力概念或者考克斯的新葛蘭西主義作爲個案研究的分析框架，但由於對該些理論不熟，故而經常是存而不論或者只作簡單的套用。既然不列顛學派已經是公認的國政經兩大學派之一，這種偏失是應該加以改進。(二) 目前國內國政經實證研究以兩岸政經關係或歐盟、東協區域化爲大宗，不過主要還是以功能主義、新功能主義、自由政府間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等主流理論爲論述基礎，事實上，從不列顛學派的視角同樣可以處理類似的問題。例如，近來簽署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與「兩岸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MOU) 之制度設計，是否結合金融資本、國家機器、媒體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形成跨越海峽兩岸的新「歷史結構」？該結構具有何種不同於以往的特徵？農、工階級和社會運動又該如何面對此一發展？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國際化，又會對國內政經結構造成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可以新葛蘭西主義的物質能力、觀念與制度的辯證關係所形成的歷史結構，以及社會力量、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三角互動分析框架進行研究。又如，對於東協的區域化發展，中國在東亞、東南亞的崛起，也能以史翠菊的安全、生產、金融與知識等四個結構性權力的互動關係來加以討論。東亞金融危機後中國如何從區域金融結構中提升國家權力，人民幣是否能成爲區域的強勢兌換貨幣或取得類似歐元的地位，其和安全、生產與知識結構又會產生怎樣的連動？這些都是很好的研究題材。(三) 當然，除了引介及延用不列顛學派的研究成果外，必須能夠不斷地提出「台灣議題」，如全球化下的台商現象、新移民、移工、貧富差距、少子化、人口老化、婦女的生產再生產活動與在地經濟的衝擊等都是很好的研究課題。以台南市學甲地區的在地養殖魚業爲例，在簽署 ECFA 之後大量的出口中國大陸市場，這是否會造成當地的政治態度、經濟結構與性別生產再生產角色的改變？針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可以是不列顛學派所倡導的問題導向、跨學科與多元視角的研究方式。

* * *

(收件：100 年 7 月 18 日，接受：101 年 6 月 5 日)

airiti



# The Brit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ritish? Global? And Critical?

*Yi-Ren Dzeng*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 Abstract

Since the 1970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PE）has explored various research methodologies and methods. However,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y of IPE is still controversial.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the British School of IPE from three dimensions. First, why is this school called "British?" Are the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British School and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ondly, British School scholars prefer to call this new discipline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GPE）"instea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us, what is the underlying meaning of "Global?" Does it require the use of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ology? Thirdly, the British School is often viewed as the "Critica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Critical IPE）". What does "Critical" represent here?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the Critical IPE and the Critic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author hopes that the discussion of these three dimensions could help us further understand the British School of IPE.

Keywords: American School, British School, Critical Theor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iriti



## 參 考 文 獻


朱天飆，**比較政治經濟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李濱，「解讀斯特蘭奇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思想」，**國際政治研究**，第 3 期（2010 年），頁 168~183。

柯林烏，陳明福譯，**歷史的理念**（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4 年），頁 11~12。

葛蘭西著，中共中央馬列編譯局譯，**葛蘭西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年）。

Arrighi, G. and B. Silver,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esota Press, 1999).

Abbott, Jason P. and Owen Worth, "Introduction: The 'Many Worlds' of Critica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Jason P. Abbott and Owen Worth, ed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p. 1~13.

Bates, Robert H., *Open-Economy Politic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ld Coffee Trad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Baylis, John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Bull, Hedley,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World Politics*, Vol. 18, No. 3 (1966), pp. 361~377.

_____,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97).

Buzan, Barry, "The English School as a Research Program: An Overview, and a Proposal for Reconvening," *Proceeding of a Conference on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English School: Close or Reconvene?* BISA Annual Conference, 20-22 December 1999,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Chan, Stephen and Jarrod Wiener, eds., *Theoriz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temporary Theorists and Their Critics* (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99).

Cohen, Benjamin J.,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_____, "The Transatlantic Divide: Why Are American and British IPE So Differ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4, No. 2 (2007), pp. 197~219.

Collingwood, R.G. and Jan van der Dussen, eds., *The Idea of History: With Lectures 1926-192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Cox, Robert W.,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0, No. 2 (1981), pp. 126~155.

_____,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iriti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_____,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s: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_____, "Toward a Post-hegemonic Conceptualization of World Order," in James Rosenau and Ernst-Otto Czempiel, eds.,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_____, "Structural Issues of Global Governance: Implications for Europe," in Stephen Gill, ed., *Gramsc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59~289.

_____, "Realism, Positivism and Historicism," in Robert W. Cox and Timothy J. Sinclair, eds.,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9~59.

Cox, Robert W., "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ssay in Method," in Cox and Sinclair,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pp. 137~140.

Cox, Robert W. and Timothy J. Sinclair, eds.,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ox, Robert W., "The 'British School' in the Global Context,"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14, No. 3 (2009), pp. 315~328.

Czaputowicz, Jacek,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ts Approach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Studies and Analyses*, Vol. 2, No. 2 (2003), pp. 3~55.

Diez, Thomas and Richard G. Whitman, "Analysing European Integration: Reflecting on the English School: Scenarios for an Encounter,"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0, No. 1 (2002), pp. 43~67.

Finnemore, Martha,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2).

Gill, Stephen, *Gramsci, Hegemony and Mater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64.

Gill, Stephen, "Epistemology, Ontology and the Italian School," in Stephen Gill ed. *Gramsc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1~48.

Gilpin, Robert, *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_____,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_____,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airiti



_____,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Goldstein, Judith L., *Ideas, Interests, and American Trade Polic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Gourevitch, Peter,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 4 (1978), pp. 881~912.

Guzzini, Stefano,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1998).

Higgot, Richard and Matthew Watson, "All at Sea in a Barbed Wire Canoe: Professor Cohen's Tansatlantic Voyage in I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5, No. 1 (2008), pp. 1~17.

Hoffmann, Stanley,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 Vol. 106 (1977), pp. 41~60.

Huntington, Samuel,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Jackson, Robert and George Sorense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Jorgensen, Marianne W. and Louise J. Phillips, *Discourse Analysis as Theory and Metho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Jones, Roy,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for Clos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7, No. 1 (1981), pp. 1~13.

Katzenstein, Peter, ed.,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78).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77).

Keohane, Robert O.,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_____,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_____, "The Old IPE and the New,"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No. 1 (2009), pp. 34~46.

Keyman, Fuat, *Globalization, State, Identity/Difference: Toward a Critical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97).

Leysens, Anthony, *The Critical Theory of Robert W. Cox: Fugitive or Guru?*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Chap. 3.

Linklater, Andrew, *Beyond Realism and Marxism: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cMillian Press, 1990).

airiti



Linklater, Andrew, "The Question of the Next Sta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cal-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Millennium*, Vol. 21 (1992), p. 78.

May, Christopher, "Structural Strangely: Susan Strange, Structural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Stephen Chan and Jarrod Wiener, eds., *Theoriz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temporary Theorists and Their Critics* (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99), p. 54.

Murphy, Craig N. and Roger Tooze, "Introduction," in Craig N. Murphy and Roger Tooze, eds.,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1), pp. 1~7.

Murphy, Craig N. and Douglas R. Nels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Tale of Two Heterodox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3 (2001), pp. 393~412.

Oatley, Thoma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6).

O'Brien, Robert and Marc Williams,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Evolution and Dynam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Odell, John S., U. 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Markets, Power, and Ideas as Sources of Chan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Oren, Ido, *Our Enemies and US: America'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alan, Ronen, 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ontemporary Theories* (London: Routledge, 2000).

Phillips, Nicola, "The Slow Death of Plur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N0. 1 (2009), pp. 85~94.

Putnam, Robert,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1988), pp. 427~460.

Ravenhill, John, 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Ravenhill, John, "In search of the missing middl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5, No. 1 (2008), pp. 18~29.

Rogawski, Ronald, "Political Cleavage and Changing Exposure to Tra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1, No. 4 (1987), pp. 1121~1137.

Ruggie, John G.,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1982), pp. 379~415.

Skocpol, Theda,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38.

airiti



Strange, Sus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of Mutual Neglec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6, No. 2 (1970), pp. 304~315.

_____, "Structure, Value and Risk in the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Barry R.J. Jones, ed., *Perspective o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Francis Pinter Publishers, 1983), pp. 209~230.

_____, "Preface," in Susan Strange ed., *Path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Press, 1984), pp. 8~9.

_____, *States and Markets* (London: Pinter, 1988).

_____, "The Persistent Myth of Lost Hegemo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4 (1987), pp. 551~574.

Strange, Susan, "An Eclectic Approach," in Craig N. Murphy and Roger Tooze,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1), pp. 33~40.

_____, "The Eclectic Approach," in Roger Tooze, ed., *New 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1991), pp. 33~49.

_____,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5), pp. 154~174.

_____,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Stubbs, Richard and Geoffrey R.D. Underhill, eds.,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Underhill, Geoffrey R.D., "States, Markets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Genealogy of an (Inter-?)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6, No. 4 (2000), pp. 805~824.

Van der Piji, Kees, *Transnational Class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85).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Waylen, Georgina, "You Still Don't Understand: Why Troubled Engagements Continue Between Feminists and (Critical) I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2 (2006), pp. 145~164.